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哲学基础探析*

赵剑英

【内容提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光辉与中国哲学智慧。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观察和把握当今时代历史方位与特征的大历史观,这是构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和科学依据。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的崇高理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三,关于要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的重要论述,为做好外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规定性和文化规定性,这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战略。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准确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哲学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 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 邮编:100037)。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08-0004-16

* 本文为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成果之一。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推进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文明观和新型全球治理观等。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光辉与中国哲学智慧,主要体现在对时代的历史方位与特征的准确把握、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阐释、科学的哲学思维方法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规定性和文化规定性的把握等方面。

一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时代观

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外交思想来源于现实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实践,反映了一定的时代内涵,科学的外交思想是以准确把握某一历史时期的时代内涵为基础的。时代是以一定的标准划分的某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时代,亦即依据的标准不同,把握时代内涵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我们划分历史时代、把握时代内涵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形成“大历史观”并以此把握当今时代的历史方位与特征,做出当今人类“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一系列科学判断,形成系统科学的时代观,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和科学依据。

(一) 历史大时代

准确把握当今国际形势,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外交政策,首先要对当今整个人类所处的大时代做出准确判断。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①他还指出:“事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①

这些论述对当今时代问题做出了科学精辟的阐述。“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基本原理即唯物史观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这里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所阐述的大的“历史时代”,它的根本性质仍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当今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人类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当今人类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质没有改变,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和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与斗争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斗争与博弈甚至会更加尖锐、更加激烈。

习近平对当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思考和把握重大国际问题和处理重大国际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以中美关系为例,将当下的中美关系放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中,才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当前其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本质。中美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不仅仅是军备、海洋、贸易金融或者高科技发展等某一个领域的竞争,本质上是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竞争的反映,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肆意以西方价值观攻击和歪曲污蔑中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与正常国际交往,通过发起贸易摩擦、制裁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①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第4—12页。

和限制人员往来等方式竭尽遏制、打压中国发展,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①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迟滞乃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尖锐性,它是无法回避的。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利用好一切机遇发展壮大自己,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既长期合作又进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从大的历史时代意义上来讲,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准确把握了当今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所处方位的基础上,习近平对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的特点做了科学判断,即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为正确认识当今国际问题实质和做好外交工作提供了科学视角。“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具有丰富的内涵,^②笔者认为其中有两点最为显著。

第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快速发展,同时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对而言在走下坡路、综合实力在下降。整个世界“东升西降”的趋势逐渐凸显。其中,新时代中国的“强起来”是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力量。这是自近代以来世界格局从未发生的新现象和新变化。

第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着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③等不利局面。就全球而言,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蔓延等全球性问题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受困于经济萎靡、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相互交织等难题,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资本主义政

^① 有关“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秋石:《认清“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真相》,载《求是》,2018年第17期,第6—10页。

^②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参见朱锋:《近期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综述》,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第6—12页。相关研究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可参见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第9—19页;黄仁伟:《如何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载《东亚评论》,2019年第1期,第4—5页。

^③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

治制度和社会治理遇到新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制度体系则使国家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面对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迅速控制了疫情,交出了抗疫斗争的“中国答卷”,充分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使“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对比更加明显。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①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国家间竞争从表层上看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和军事的竞争,而从深层上看则是制度的竞争。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竞争的准备,我们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阶段有清醒、科学的认识。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②

新时代与历史大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紧密关联的,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这两个大的时代刻度中,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与“不变”,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其中的“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和示范意义彰显。首先,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其次,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②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页。

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 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第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不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们仍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当今人类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 然趋势，在这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道路的斗争与 合作将长期存在。第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看，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第三，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尺度看，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了新时代，这个 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人民历 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 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 化，同国际社会的互动空前紧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因此，必须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归结起来，在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就是要遵 照习近平指出的时代观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 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与走向，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变”与“不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这一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判断世界发 展大势，做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的科学决策。

二 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 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背景、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刻阐述。笔者认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观，是对人类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新构想。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人类共同

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习近平站在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上,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①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有着本质区别。基于思想与文化上的优越心态,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西方式的价值观念与制度设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图将其包装为“普世”模式。“普世价值论”的本质就是将西方制度模式化,并上升成向全世界输出西方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与道德依据,是将自身的特殊价值普遍化。实际上,近年来伴随着民粹主义横行、治理效率低下、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撕裂等内部治理问题纷至沓来,西方国家纷纷陷入了治理困境,西方“普世价值”的弊端已经不断暴露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西方文化只是文化中的一种,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人类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②与之相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是真正着眼全人类的发展和命运、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共同价值。^③全人类共同价值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崇高理想。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一崇高理想站在了人类道义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真正代表全世界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根本利益。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利益的体现,超越了世界各国的差异与分歧,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做了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④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⑤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集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2页。

② 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载《光明日报》,2016年9月7日。

③ 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张宇燕主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22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2页。

中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①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② 此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其内涵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同时还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和文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正是基于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所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基础上,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首先,人类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将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代世界一股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彼此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此同时,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强,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推动经济全球化与深化国际合作遭遇了空前的阻力,全球发展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四大挑战,全球性问题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新思维、新理念、新途径为解决这些问题指明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立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给出的中国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一元道路,摆脱了自我优先的霸权思维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束缚,为“包容”“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注入动力,让各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化与获得发展红利,真正把全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实现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无论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还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都体现着中国外交关照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的崇高追求。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基因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实践为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中华文化追求“和为贵”,强调和谐统一、“和而不同”以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性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7—58页。

发展。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深刻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传统“义利观”“和合文化”“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亲仁善邻”等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国人天下情怀和整体思维的时代创新，这些理念至今仍然体现在中国的外交工作实践中。同时，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②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的基础上，倡导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破解“文明冲突论”等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困惑。

最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蕴含着一种生命共同体意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来自自然、经济、社会的多种凶恶风险挑战客观上决定了人类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当前全球性问题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事关全人类的命运与福祉。中国坚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世界各国遵守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呼吁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既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使然，也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病毒不分国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③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表明人类对自然仍有许多未知领域，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在这场灾难面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空前彰显。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类

①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16 日。

②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载《求是》，2019 年第 9 期，第 4—12 页。

③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6 日。

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①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在中国积极不懈地推动下,增强团结合作以应对疫情成为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普遍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国内疫情,为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宝贵时间,给全球抗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丰富与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②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全新倡议,并宣布一系列有力举措,对支持全球抗疫做出了庄重承诺,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作为,真正落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中国也将继续站在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继续坚持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确定性。

三 运用科学的哲学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看家本领,尤其提出要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③形成了体大思精的改革方法论,这也为做好外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一) 战略思维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所谓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战略思维。毛泽东强调,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战略头脑”,即战略思维能力。邓小平曾告诫,“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④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多次强调在改革和发展的各项工

① 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

②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4月3日。

③ 有关五种思维能力的充分讨论,可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244—246页;王伟光主编:《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2—7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作中要有战略思维。具体到外交工作中,习近平深入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亲身运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谋划,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合作密切结合、通盘规划、整体推进,同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也是战略思维的重要体现,它统筹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对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做出了全方位的思考与界定,并且有效协调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从战略高度审时度势,系统回应我们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切实维护好中国国家利益。^①

(二) 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能力,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②外交工作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与把握,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不仅要要看现在国际形势怎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③“‘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以史为鉴,不让历史悲剧重演。”^④只有尊重历史规律、顺应时代潮流,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把握人类发展的共同诉求。一些西方国家固守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的框架,打压、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注定不会成功,应当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方位,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应对这些挑战。

(三) 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人们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学习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要点之一就是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⑤ 在外交工作中,一方面就是要

^① 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张宇燕主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研究》,第63—71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7页。

^④ 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242页。

厘清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例如,当前的外交工作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重要抓手,为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应该利用矛盾,将外交工作中的风险与挑战转化为机遇,例如利用好美俄矛盾、美欧矛盾、俄欧矛盾、英欧矛盾以及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外交的转圜空间,从而掌握主动性。

(四) 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就是破除迷信、超越过时的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习近平指出,“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① 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就是要从根本上破除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形式主义和无所作为,转变思维习惯、突破思维定式,在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实现变革和创新。习近平外交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孕育了一系列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例如习近平在2014年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正是中国在周边外交和国际安全观上的重要创新,它反映了地区安全现状和普遍诉求,为各国维护共同安全、化解矛盾风险、构建区域安全架构提供了新思路。“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倡议的提出也都是创新思维的产物。

(五) 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以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精神及法治思维同样贯穿整个外交活动领域,在具体外交实践中尊重国际法、坚持运用和发展国际法。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而缔造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当前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可以看到一些国外政客、商人乃至法律界人士试图在病毒溯源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甩锅”中国,发起多场“向中国索赔”的滥诉闹剧。这些诉讼没有事实、法理和法律上的根据,实质是为污名化中国进行舆论炒作。在对待这些滥诉时,应当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坚持基于科学精神、事实与国际法法理,冷静予以揭露和应对。

(六) 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以底线为导向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能力。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② 底线思维在外交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9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

工作中相当重要,中国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是有底线的: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始终注重划出红线、亮明底线,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整个中美经贸谈判过程中,中方不卑不亢、坚守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坚决捍卫了中国国家利益。

四 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的历史规定性和文化规定性

习近平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规定性和文化规定性,这一阐释深刻揭示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走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老路的根本缘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辛探索中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国道路,创造了“两个奇迹”。^①在笔者看来,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三点:一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二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的人民性,它没有自身私利,而是为了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就使得中国的治理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三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当今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是懵懵懂懂的选择,不是历史的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九十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搞清楚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及其演进,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就能明白,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②

历史规定性和文化规定性决定了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分不开的,也是中

^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25页。

国人民历经艰难困苦奋斗摸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人间正道是沧桑。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发展起来了,将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领导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底色和最大优势。^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立场是要坚定地维护与发展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在短短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里实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两百年才能达到的工业化成就,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辉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成为在当今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政治大国,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道路问题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实现社会主义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科学之路。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当为捍卫中国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发展争取最大的国际支持。一切有损或阻碍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因素,都必须坚决予以反对。事实上,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狭隘的“普世价值”观和冷战思维,一再诟病与妖魔化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影响与改变中国的道路与发展方向。当中国没有走它们的道路、未按照它们的设计去发展,而是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时,它们又妄图以新的抹黑攻势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包括在高科技领域渲染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威胁”、在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持续抹黑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以及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污蔑中国“经济渗透”“制造债务陷阱”等,甚至抛出“改造中国失败”的谬论,试图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③ 这些做法完全忽视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规定性与文化规定性,反映了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文化傲慢心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

① 《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载《人民日报》,2019年5月15日。

② 杨洁篪:《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载《求是》,2018年第18期,第79—80页。

③ 王毅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强调:“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任何国家也都不会按照别人的好恶来改造自己的制度。归根到底,制度和道路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决定。”参见《守正不移,与时俱进 维护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王毅国务委员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的致辞》,http://www1.fm-prc.gov.cn/web/wjzbhd/t1796282.shtml,访问时间:2020年7月11日。

直面与破解充满西方偏见与误解的中国政治叙事,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是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集中体现。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尊重每个国家根据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和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有信心、有能力带动各国共同发展;不仅能够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智慧,也能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路径。^① 这些才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本质也是最有意义的成果。未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继续推动更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② 中国道路在外交政策上的具体反映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同样具有内在的历史规定性与文化规定性。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中国近代史的屈辱经历让中国人民更加热爱和平,更加意识到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和平的外部环境,发展就无从谈起,我们不能让历史重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对前人的责任,对后人的责任。”^③

从文化上来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

^① 《王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式讨论时发言》,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21期,第6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70页。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不仅仅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是处理民族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准则。^①

中国道路的历史规定性和文化规定性决定了中国在发展起来之后不会走上“国强必霸”的老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都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重视“达己达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把和平与发展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还推动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深度融合,^②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合理兼顾他国利益,强调合作共赢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下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必将在世界上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五 结论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外交思想,而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与实质具有重要意义。对时代问题的准确把握、关照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运用科学的哲学方法观察与分析国际问题以及深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规定性和文化规定性,都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与发展,贯穿于当今中国外交实践中。可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一根本理论特征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和展现。

(截稿:2020年7月 责任编辑:郭 泉)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70—171页。

② 吴志成、吴宇:《习近平外交思想析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第14页。